

葛剑雄

随笔

感谢机遇：我的 1977、1978 年

每当恢复高考一个十周年时，都会有记者来采访，编辑来约稿，以为我是 1977 年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批大学生，其实我不是。恢复高考后我也曾兴冲冲地去报名，工作人员看了我的证件后告诉我已经超龄。规定的年龄是 30 足岁，即在报名时不满 31 岁。我出生于 1945 年 12 月，当时已过了年龄。有人劝我凭着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给领导写信，争取破例。当时习惯于服从组织安排，觉得既然不符合报名条件就只能服从。

没有几个月，公开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公布了。开始我没有在意，因为我知道研究生比大学生高一个等级，大学毕业后才能报考，与我没有关系。不久看到具体报道，知道报名年龄放宽到 40 岁，而且没有学历条件。记得《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文章《不拘一格降人

才》，强调研究生招生在年龄、学历、家庭出身、本人表现上都要实事求是，不拘一格。我想，上大学本科的路已经断了，要实现上大学的梦想只能靠考研究生了。再说，我只有高中学历，就是考不上，也不丢脸，更不会有什么损失。报名时果然非常顺利，听工作人员说，已经报名的人中还有初中学历的。不过我心里还是没有底，平时不露声色，连单位同事也没有告诉。当时我在中学负责学生工作，考试那几天，每天照常主持 8 点钟的升旗与广播，结束后才骑自行车到不远的上海工学院（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考场，参加 9 点钟开始的笔试。接到复试通知后，按规定在职人员可享受 10 天备考假，我报考的事才在单位公开。

复试包括导师的面试，因为谭其骥教授正在龙华医院住院治疗，我们 5 名考生是到医院去接受面试的。复试下

来，自我感觉不错，又开始担心工作单位会不会放我走。那时我是这所中学的专职学生团委书记，兼着教革组（相当于“文革”前的教导处）副组长，负责全校学生的管理，一年前刚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本区中学老师中唯一的市人大代表。“文革”中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走白专道路的批判言犹在耳，心有余悸，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中学教师想读研究生，不是为了成名成家又是因为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我对学生的日常教育，如果上级拿来要求我，说党需要我继续在中学工作，我能不能服从吗？

当我忐忑不安地将录取通知交给党支部书记时，他却没有任何犹豫，告诉我已经将我的工作分配给其他人，我可以马上办离校手续。事后我得知，复旦大学历史系派往我校为我作政审的总支委员与支部书记认识，他读中学时曾到区少年宫服务，而支部书记那时担任少年宫主任。在得知我肯定会被复旦大学录取后，支部书记就请示过区教育局。教育局长的态度十分坚决：“如果他能考上研究生，说明国家更需要他读研究生，一定要支持他去，学校的工作再困难也得克服。”我的工资还是由中学照发，直到我研究生毕业，才转到我新的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其间一次工调还加了一级工资。据我所知，两年后市里就发了通知，要求稳定中学教师队伍，再报考研究生没有那么容易了，有一位老同学考上后还是被本单位强力挽留了。

1978 年 10 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报到，我发现幸运才刚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全面落实，曾经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授重登讲台，重返研究室，重招研究生，我们这批研究生不仅选到了泰斗级的导师，还有机会听到他们讲课，得到他们的耳提面命。章巽（丹枫）教授是中西交通史专家，“文革”期间被勒令退休，当时刚被重新请回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曾

安排我接受他的指导，并为他做些辅助工作。当时章先生正在进行《法显传》考释，他让我去上海图书馆核对本。我自以为非常认真，但章先生还是在我的校勘中发现了两处错误。他告诉我，哪怕一个错字，也会造成误判误导，有时会形成错误的结论。他又给我分析不同语源的汉译形成的差异，要求我重视外国学者的成果，学好外语。有一阶段，我几乎每周都要去山阴路章先生家，尽管只有一个学期，以往从未受过学术训练的我受益无穷。后来章先生招了马小鹤、任康康两位研究生，我曾与他们开玩笑：“我应该是你们的师兄。”

1980 年秋，研究室领导安排我担任谭先生的助手，经常随同他参加学术活动，出席会议，为他处理信件，联系工作。1981 年 5 月，我随侍他去北京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大会，以后几乎每年随他参加年度大会或地学部的会议。浙江大学出身的委员有四十多人，大多是谭先生熟识的同事，还有他的学生和听过他课的，加上他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北京的旧友，每天我都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讨论、交谈、忆旧，亲炙他们的真知灼见，珠玑妙语，有的终身难忘。

我的硕士论文准备做历史人口地理方面的，谭先生说：“我不懂人口学，可以介绍你去找吴斐丹。”有次我提到胡焕唐先生提出的瑗瑗—腾冲线，谭先生说你何不直接向他请教呢！胡先生在“文革”前就已销声匿迹，“文革”期间更受到严重迫害，重新露面后就像出土文物，在广东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选举理事会时居然落选，因为中青年代表根本不知道他。有了谭先生的介绍，我两次去华东师大一村他家中求教。他很感慨，这么多年没有人来问瑗瑗—腾冲线了。有一次我谈及对《梦溪笔谈》一条解释的异议，谭先生又联系了胡道静先生，安排我求教的机会。

我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是王仲荦、史念海、孙毓棠、李旭旦、杨向奎、杨宽、吴传钧、吴泽、吴斐丹、张维华、陈桥驿、林甘泉、周一良、周谷城、赵俪生、胡焕庸、胡道静、侯仁之、蔡尚思、黎子耀，答辩委员是侯仁之、史念海、杨向奎、吴泽、杨宽、程应镗、陈桥驿等先生，在当时也称得上超豪华。

如今这些老师都已归道山，有的在我求教不久就告别人间，或者失去了工作能力。

每忆及此，除了永铭师恩外，我永远感谢恢复高考、公开招收研究生这一历史机遇。

筆會

周末茶座



顾 铮

非专业眼光

刘抗眼中的青年傅雷

新加坡画家刘抗(1911—2004),出生于福建,后在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任西洋画教授。1942 年,他定居新加坡。刘抗曾经于 1920 至 1930 年代留学法国。在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同期在法国游学的傅雷,两人从此订交,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作为一个画家,刘抗为推动新加坡美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喜欢摄影,身后留下大批拍摄于民国时代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被他录入镜头的当时活跃于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不在少数。这些照片现在正逐步由刘抗的儿媳、作家格兰馨·刘整理并数字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连同她所撰写的刘抗传记,我们会看到更多由刘抗拍摄的民国艺术家照片。

在这幅由格兰馨·刘提供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了刘抗眼中的青年傅雷形象。照片中的傅雷跃身树上,展示了后人难得一见的“怒庵”先生活泼好动的一面。

刘 铮

西瞥记

汪荣宝的法文藏书

一直觉得，汪荣宝称得上是晚清的一个“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 man)。以著作来说,遍及四部:《思玄堂诗集》是清季西昆体的代表作,《法言义疏》是诸子学的名著,与许国英合撰的《清史讲义》是写得早而今天依然值得读的清代史,至于与叶澜合编的《新尔雅》,虽然内容已为“新学”,但按四库的分类法,还算经部小学类罢。事功方面,推动晚清、民国宪政,《大清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都少不了他的参与。入民国,做议员,复转事外交,先后任驻比利时公使、驻瑞士公使、驻日本公使。在政学两界有如许成绩的,即便在俊彦辈出的近代,也不多见。

今年 3 月,我买到一套法文版的卢梭《忏悔录》(Les confessions)精装本两卷,由 Van Bever 编订,巴黎 Georges Crès 书局 1914 年出版。该书装帧颇精,书顶刷金,用纸尤坚韧,在法国书里算是相当好的。第一册内封铃一篆印,印文为“衾父所藏”。汪荣宝,字衾父,且近代名人以“衾父”为字者似也只有这么一位。如此说来,这书该是汪荣宝旧藏了。

然而,在我印象里,汪荣宝是留日出身,懂日文理所当然,难道他还能读法文吗?前两年是读过《汪荣宝日记》的,未见其有懂西文的迹象。嗣后,偶阅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才把疑虑打消了。王揖唐记汪荣宝:“君与余共

事议席,投契夙深。使欧数年,法语精进,有如素习。侨墓中壮年勤学,旁通西文者,同年章菴生(祖申)外,未见有第三人也。”今本《汪荣宝日记》只收 1909 年至 1912 年日记,而汪荣宝出为驻比利时公使则在 1914 年,看来汪荣宝是使欧后方学的法语。三十几岁开始学一门外语,几年工夫,达至“有如素习”的程度,汪荣宝之勤学,的确令人敬佩。

《思玄堂诗集》中有七律《留滞》一首,题后自注“欧战时驻比京作”,说明是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德军将占布鲁塞尔之际所作。颌联云:“对月略能推汉历,看花苦为译秦名。”后面一句,或许是说观看西洋花木时还思付着如何回译为中文名。大概这时候汪荣宝已经在学法语了罢。

那两卷卢梭《忏悔录》出版于 1914 年,时间上倒也对的上,只是不知汪荣宝是在比利时买的还是在比利时沦陷后随比政府流亡法国时在法所购。

不过,汪荣宝好像并没有读过此书,因为很多书页都没裁开。说起来怪有意思的,我发现他没读过,心下倒释然了,频年所得名家旧藏之书不少,其中自不乏通篇批点,丹黄烂然者,看了固使人平添几分向学的志气,而书页未裁的,却也碰到过不止一回了,“原来名家也有买了书囿着不读的啊”,这样想着,心里的意气就稍稍平了。

叶 扬

名著与画

贝内特与《八十天环游世界》

凡尔纳与威尔斯并列,有“科幻小说之父”的声誉,美国现代作家布莱伯利甚至说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说,我们全都是凡尔纳的孩子。”凡尔纳青年时代曾经跟大仲马说过,自己有志于创作一种“科学小说”(roman de la science),受到了后者的鼓励。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凡尔纳结识了曾经替巴尔扎克、雨果和波德莱尔出版的著名出版家赫泽尔。赫泽尔当时正创办一本定名为《教育与娱乐》的杂志,他的构想是约作家在杂志上先以连载方式发表作品,随后出书。两人见面交谈后一拍即合,凡尔纳成了赫泽尔的主要特约作家,他们的合作带来了彼此的成功。巴尔扎克的小说有《人间喜剧》的总称,在赫泽尔的提议下,凡尔纳的五十余部长篇作品,也归纳到《奇游记》的总称之下。

《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凡尔纳最负盛名之作,但是就其内容而言,却没有多少科学幻想的因素。其实凡尔纳也说过,他从来不曾自诩为科学家,他的兴趣所在,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地球,而他最为专注的,莫过于地理知识。在创作这部小说之前三年,苏伊士运河、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以及印度次大陆的铁路连线,先后开通,为他构思这部作品提供了现实条件。小说结尾,情节急转直下,福格先生忽然发现自己多了一天时间,转忧为喜,及时赶到俱乐部,赢得了赌注。运用这种“剧场效应”(coup de théâtre)的灵感,则来自爱伦坡一篇题为《一周三个礼拜天》的小说。凡尔纳的作品,在生前获得乔治·桑、戈蒂埃等名家的赞誉,可是商业上的成功,以及包括左拉在内的某些作家的严苛批评,影响了他身后的声名。不过,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罗兰·巴特、福科等批评名家,撰文推崇凡尔纳的作品,如今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重新得到承认。初中时代,我曾经遍读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版的凡尔纳中文译本,自是一番难忘的经历。日后从原文重读《八十天环游地球》,发现凡尔纳的文字简洁精炼,行文节奏明快,叙事手法也颇有层次,字里行间往往另有用心,确为一代高手。



赫泽尔出版凡尔纳的作品,通常先出没有插图的十六开本,随后再发行附有插图的精装八开本,后者如今已被收藏家视作珍宝。《八十天环游地球》在 1872 年年底以连载方式在《双周刊》上发表,次年一月,平装本出版,而附带插图的精装本,则要到 1873 年 12 月才问世。为这部版本作图的是德·奈维尔与贝内特(Léon Benett, 1839—1916)两位名家,插图右下角有他们分别的签名,可知为哪一位所作。贝内特一生在海外任职多年,历游北非、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插图是他的副业,他在画作中特别喜欢描摹异域风情。《八十天环游地球》是他为赫泽尔作插图的外处作,随后的三十七年间,他一共为廿五部凡尔纳的作品作了插图。这幅插图出自小说第十二章,描写福格和路通一行人穿越印度丛林时,正好遇上艾娥达族族人麻醉后带去祭坛,准备次日凌晨进行印度旧俗“娑提”殉夫仪式的情景。

陆 蓓 容

望野眼

松鼠

办公室附近有松鼠,这是人职以来就知悉的,不过,它们大约也知道某楼某间多出个新人类,谨慎起见,危言危行,几乎不肯走到窗边。但残冬枝叶凋零时,毕竟见过一位。它神色慌忙,跳到光秃秃的玉兰树枝上,抱着花苞开始啃。仿佛前有猛兽,后有追兵,眼前是最后的午餐。着急、又贪婪,嘴里还鼓鼓囊囊,爪子已弃去残萼,去握新苞。树枝摇动,大渣子簌簌往下掉。在阴惨惨的天底下,它们敲响饥饿者的命运之歌。

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妇人之仁,自谓尚有。最近从家里检出半桶无人问津的大杏仁,高高兴兴带去给它们加餐。打开窗,抓一把,放在设备阳台的围栏上,然后垂头做自己的胜业。过一会儿,觉得眼角余光抓住了什么东西,抬头一看却是喜鹊。是一位中等身材、灰蓝尾羽的朋友,平头坦腹,面不改色。走两步,叼一颗,飞走。如是者再,松鼠却不曾来。下班时间看看窗外,橙黄色的杏仁儿孤单地坐着,梅雨

潺热,恐怕已经潮了吧。关上门再打开,已是三天后事。但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乎乎的杏仁味儿——要糟!脆弱的神经如弦绷紧,走到桌前,眼为之花。这张九十年代机关事业单位风格的红褐色办公桌,被数不清的黄泥爪印涂成现代派油画。画布中心在左侧,那装了杏仁的大罐子周围,碎屑与泥印交辉。

塑料罐盖跌在地上。捡起它,但见一个深深的四趾爪痕,“入木三分”。又有几道纵横印记,深浅不一。看这爪印该是松鼠,可能能保证喜鹊们没来帮忙呢?似乎大家齐心协力,费了老鼻子劲儿才打开。

想必有过好几场狂欢。它们从桌子上、椅背上、显示器的边沿上,走到杏仁罐前边,一屁股坐下。没有背包,嘴塞藏不了多少,只好放开肚子吃。那些囊印大大小小,也许谁带来了未成年儿童?“还在长身体,可一定要多吃点儿啊!”

从这天后,常看见松鼠来到窗前。

陈子善

不日记

“把我包括在外”



经缩减到实在无法交代的程度,电影影集只好援引制片家高尔温那句名言:“把我包括在外。”仔细看了您寄来的企划书后又充分考虑过,所以没能照您所嘱从速答复,希望没耽误计划的进行。您节目内要用《对照记》里的图片文字,本来不成问题,可径与皇冠接洽,当然光用它根本用不上。惟有遥寄最深的歉意。

匆此即颂

大安 张爱玲

张爱玲这封信以传真的方式发给雷骥兄,时在 1994 年 8 月 18 日。一年之后,她就孤寂地离开了人世。而在此之前一个月,她生前的最后一部书《对照记——看老照相簿》刚刚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张爱玲在《对照记》的“题记”中说得很清楚,她把这些“幸存的老照片”整理并加上文字解说付之出版是“藉以保存”,但当“作家身影”摄制组拟采用更高的技术手段“保存”她的影像和声音而要求采访她时,她却选择了婉拒。

其实,据我所知,“作家身影”的要求很低,只要张爱玲能在摄像机前露一下脸,说上几句话,就大功告成。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是,张爱玲并不愿配合,尽管我们也知道她当时在洛杉矶确实深居简出,几乎不与人来往,尽管她信中所说的“体力精力不济,自己的工作时间都已经缩减到实在无法交代的程度”也确是实情。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特别援引好莱坞制片家高尔温的“名言”“把我包括在外”表明自己的态度。

“把我包括在外”是句幽默的隽言,张爱玲已是第二次引用了。早在 1979 年 2 月,她经常撰稿的台北《联合报》副刊新辟“文化街”一栏,寄表格请她“填写近址的城乡地名与工作性质”,这当然是不情之请,张爱玲也当然会婉拒。于是她写了短文《“把我包括在外”》,还对“把我包括在外”这句高尔温“最有名的名言”大表赞赏。张爱玲至少两次“把我包括在外”,性质并不相同,但她第二次“把我包括在外”,却失去了最后一次让她的影像和声音留存于世的机会。这对她本人而言,一定不会在乎,而对她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

迈 克

半上流

芒果的滋味

《香港文化众声道》提起新马版《学生周报》,隔山隔水,资料不齐全在所难免,我念在那是最早投稿的福地,冒昧向几位当地的昔日文友查询。吉隆坡老友记忆力向来惊人,这回却有点老猫烧须,既想不起周刊改成半月刊和月刊的先后次序,也说不出它正式关门的日子。

不过宝刀当然不会生锈,笔锋一转,清晰叙述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游迹:“我就猜到你会忘记第二次来吉隆坡的事,第一次是赴美国前,好像是马来西亚走一圈,我还记得你是住在太平洋酒店呢。第二次来,就是你第一次从美国回归祖国探亲那年,好像日子长些,所以有空来两天。住在吉隆坡的 YMCA。”这番话假如由别人说出,我必定以为自己凭空掉进间谍片,被心怀不轨的情报工作者以土法洗脑,然而吉老不可能设计害我。赤裸裸提供两段遗忘了的往事,下榻地点一五一十。

岁月如水,太平洋早和大西洋混为一体,那回我隐约记得与一位姓潘的同学搭火车,一路上小声讲大声笑,

不但扰人清梦,自己也整晚不得安宁,抵埭之后的情况片甲不留。据说投宿青年会的第二次旅程,干脆连影子也没有存在档案,以致每逢有人问起熟不熟悉近在咫尺的马来西亚首府,我都老实回答“生平只去过一次”。至于“马来西亚走一圈”的壮举,倒该是吉老美丽的误会,他的故乡马六甲我印象中不曾踏足,近年以美食闻名的檳城更肯定没有造访——小时候听大人眉飞色舞描述当地名蛇吃猪,惊吓度只有毛骨悚然四字可勉强形容,绝对不会愿意自动送羊入虎口。

《八十日再次环游世界》的 Cocteau 当然没有放过猎奇良机,一登岸就坐人力车直奔主打景点:“蛇庙的蛇统统披着石头的颜色,看起来像座机关密布的建筑,四处暗藏产生动感的装备,它们一时蜷缩一团,一时缓缓舒展,图案永远在更改中。”鸦片美学专家的观察果然非同凡响,更妙的是这段:“马来半岛地理造型像个芒果。你尝的第一个芒果美味可口,第二个——太可口了;到了第三个,无论如何不会再吃得下。”